·社会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4.06.013

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及其变迁

政光景[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中心,北京 102488)

[摘 要]本研究聚焦于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基于具有中国文化情境的线上逝者纪念数据,采用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范式,并利用文本分析和统计模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较高的自我发展道德有损社交地位,而较高的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有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他者取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和发展取向的道德更有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从变迁上看,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对社交地位的负面作用和偏集体主义的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均在减弱,二者的社交地位效应呈现收敛性。

[关键词]道德;社交地位;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4)06-0141-12

一、引言

个人的道德会对其地位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过往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积极的道德品质有利于社会地位的提升①。但此前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社会地位主要指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二是道德主要指利他主义道德。不同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探讨多维度道德对个体社交地位的影响及其变迁。其中,多维度道德是基于自我—他者维度和发展—克制维度构建的四类道德,相比于利他主义指代的狭义的道德,其具有更为广泛的道德内涵。而社交地位(Sociometric Status,SMS)被广泛用于同伴关系研究,用来评估群体内人员之间的积极或消极的关系②,它是从社会环境、关系的视角去评估社会地位③,强调个体在其生活圈(家庭、朋友、职场等)中所处的位置④,其是在特定文化、情境或时间背景下的人类互动中产生的⑤。相比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交地位的评价是主观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对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24BSH025);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智能技术的社会价值观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24QQJH152)。

[作者简介]政光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邮箱:coolguangjing@163.com。

①Michael P. G. ,Robbie C. M. van Aert,Mitja D. B. ,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s of Person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Size with Soci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50, No. 3, 2024, pp. 253-283.

②Cillessen A. H. N. , Sociometric Methods, in *Handbook of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Rubin Kenneth H. ,Bukowski William M. ,Laursen Brett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1, pp. 82-99.

③Coie J. D. ,Cillessen A. H. N. , Peer Rejection: Origins and Effe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3, No. 2, 1993, pp. 89-92.

④Carboni I. , Casciaro T. , Love Me or Hate Me: Exploring Controversial Sociometric Status, in *Leading Through Conflict: Into the Fray*, Donelson R. Forsyth, Dejun Tony Kong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 pp. 109-129.

⑤Bai F. ,Ho G. C. C. ,Jin Y. , Does Virtue Lead to Status? Testing the Moral Virtue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8, No. 3, 2020, pp. 501-531.

对于行动者本身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研究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能更好地体现出不同的道德维度被社会倡导和认可的程度。

本研究基于具有浓厚中国文化情境的线上逝者纪念数据,采用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的范式,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和统计计量模型,回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在四类道德中,每一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作用如何?哪种取向的道德更有利于提升社交地位?在中国当代社会,各类型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随着时代变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二、文献回顾

(一)社交地位的内涵与性质

社交地位被界定为由荣誉、尊重、钦佩、仰慕、声誉、影响力定义的社会地位[①],也有部分研究将他人的喜欢和羡慕纳入社交地位的范畴[②]。个人或团体可能会取得重要的客观成就,但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成就,并改变其尊敬程度,则该个体或团体的社交地位不会发生改变。换言之,客观成就只能通过评价者的主观认同转化为地位。由此可见,社交地位是一种相对地位,是所有个体都可以拥有的。此外,一个特定个体的社交地位是大体稳定的,因为人们一般会对个体或群体的社交地位达成高度共识[③]。由此可见,一个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并不一定社交地位就高,反之亦是如此。

(二)道德的理论分类

道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道德多指利他主义,而广义的道德既包括公德,也包括私德,如勤奋、自律这类非利他主义特质也属于广义道德的范畴。本研究采用广义道德的内涵,以此打破过往研究集中于狭义道德的局限。道德具有多种理论分类。第一种分类是发展取向与克制取向的道德类型。如亚当·斯密将道德分为积极关心自己或他人的道德和自我克制和控制的道德[④]。与之类似,有道德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⑤]、规定性道德和禁止性道德的区分[⑥]。第二种分类是自我取向与他者取向的道德类型。亚当·斯密认为,美德既可以存在于对个体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中,也存在于对他人幸福的考虑中[⑦]。休谟、密尔、涂尔干、斯洛特等人均对道德作出了个人与社会道德的划分[⑧]。

本研究将道德的自我、他者取向与发展、克制取向的维度进行交互分类,构成了自我发展、发展型利他、自我克制、克制型利他四种道德类型,即道德的四分类模型(见图1)。自我发展道德强调个人通过克服自身惰性,积极提升自我,成为更优秀的个体,属于典型的个体主义的道德(如勤奋、博学等);自我克制道德则强调通过克服自身欲望,达成自身利益的优化,是在短缺经济状况下较

---

①Magee J. C. , Galinsky A. D. , Social Hierarchy: The Self-reinforcing Nature of Power and Statu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 2, No. 1, 2008, pp. 351-398.

②黄婷婷,刘莉倩,王大华等:《经济地位和计量地位: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差异》,《心理学报》,2016年第9期。

③Anderson C. , Srivastava S. , Beer J. S. , et al. , Knowing Your Place: Self-perceptions of Status in Face-to-face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1, No. 6, 2006, pp. 1094-1110.

④亚当·斯密著,李伟霞译:《道德情操论》,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241页。

⑤王小章:《结构、情感与道德:道德转型的社会学探索》,《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⑥Janoff-Bulman R. , Sheikh S. , Hepp S. , Proscriptive Versus Prescriptive Morality: Two Faces of Moral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6, No. 3, 2009, pp. 521-537.

⑦亚当·斯密著,李伟霞译:《道德情操论》,第196-197页。

⑧陈来:《儒学美德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4页。

为盛行的道德，属于一种短缺价值（如节俭、吃苦耐劳等）；发展型利他道德则强调个体积极地利及他人或集体，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道德（如助人为乐、体贴等）；克制型利他道德则要求个体克服自身欲望，以不至损害他人或集体的利益，属于底线道德（如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四类道德的内涵分别与个体主义、短缺价值、利他主义和底线道德内涵接近，但并非完全等同。后三类道德与自我发展内涵相异，属于偏集体主义的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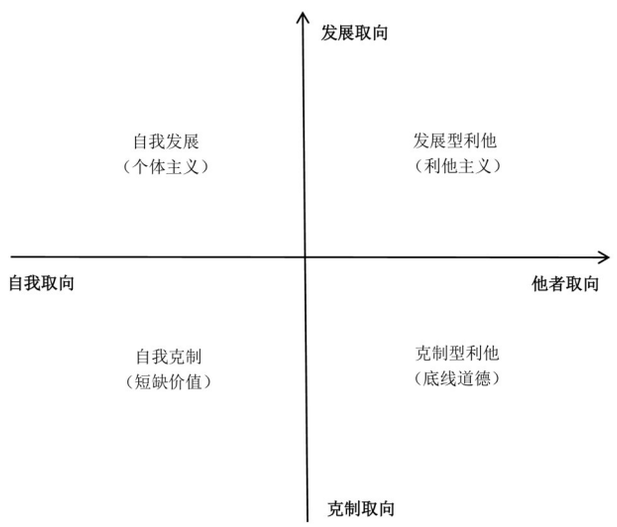


图1　道德的四分类模型

（三）道德影响社交地位的机制

道德有利于提升社交地位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明[①]。但过往关于道德影响社交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他主义或亲社会性对社交地位的影响上。个体的亲社会性会形成亲社会名声，并以此提高个体的社交地位[②]。仁慈、慷慨的个体会有更高的地位与威望，亲社会性得分高的个体也更可能成为领导者[③]。由此可见，个体具有较高尚的道德品质，有利于提高其社交地位。

那么，高尚的道德导致更高的社交地位的机制如何呢？获得社交地位大致有四种路径。一是支配路径：这个路径基于支配理论，提出个体通过展现支配性和威胁性来获得社交地位[④]。这一路径与道德的关联性不大，因此不做赘述。二是能力路径：这一路径源自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个体的能力既能引发对其的尊重[⑤]，也能因其能力对群体做出较大贡献，而获得社交地位。三是美德路径：即个体通过展现美德行为（如慷慨、谦逊和忠诚）来获得社交地位。这一路径也可称为“社会认可”机制或“美德—敬佩”机制，即当道德行为主体表现出积极的道德品质或行为时，其会得到更高的社

①Flynn F. J. , Reagans R. E. , Amanatull E. T. , et al. , Helping One's Way to the Top: Self-monitors Achieve Status by Helping Others and Knowing Who Helps Who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1, No. 6, 2006, pp. 1123-1137.

②Brambilla M. , Sacchi S. , Rusconi P. , et al. , You Want to Give a Good Impression? Be Honest! Moral Traits Dominate Group Impression Form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51, No. 1, 2012, pp. 149-166.

③Price M. E. , Pro-community Altruism and Social Status in a Shuar Village, *Human Nature*, Vol. 14, No. 2, 2003, pp. 191-195.

④Michael P. G. , Robbie C. M. van Aert, Mitja D. B. ,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s of Person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Size with Soci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50, No. 3, 2024, pp. 253-283.

⑤Wojciszke E. B. , Abele A. E. , Baryla W. , Two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itudes: Liking Depends on Communion, Respect Depends on Agenc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9, No. 6, 2009, pp. 973-990.

会认可,人们更愿意与之交朋友[①]。四是微观政治路径:即为了获得社交地位,个体需要让其他群体成员相信他们具备对群体有益的能力和集体意识,这也可以称为"信号释放机制"[②]。

三、理论、数据与假设

因本研究的几个研究问题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过往的理论和研究并不能给研究假设推断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范式[③],进行研究假设的推断。在此之前,本部分将先介绍研究数据和操作化测量。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从中文互联网上爬取的公开的线上逝者纪念数据。这类数据一般包含了逝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等部分个人信息和撰写者对逝者生平介绍的纪念性文字。因中国历来有"盖棺定论"的说法,因此,这些纪念性文字中包含了大量对逝者的道德评价内容,也包含了与逝者社交地位密切相关的评价内容。由此可见,线上逝者纪念数据非常适用于研究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本研究的样本单元为逝者,数据的生成时间主要在2000—2021年间。研究对象限定为逝世年份在1950—2019年、出生年份在1900—1999年、年龄为20—100岁的逝者,有效样本量为145160个。

因线上逝者纪念数据均由网民自主生成,属于典型的用户生成内容,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偏误,因此,基于这一数据构建的逝者样本必然与真实的死亡人口不一致。为此,本研究采用校准加权的方式,通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死亡人口数据,对该数据进行加权调整。加权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主要是对死亡人口的年龄、性别和不同时期的死亡人口规模进行加权[④]。

(二)操作化测量

本研究要解决的两个核心测量问题就是对逝者的四类道德和社交地位进行测量。参照相关研究,本研究基于四分类道德词典,并采用总文本锚定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对四类道德得分进行计算[⑤]。因中国传统中有"死者为大"的观念,因此,对逝者的道德评价必然以正面和积极评价为主,但因本研究并不关注对逝者的评价是正面还是负面,而只关注逝者更多地被哪一类型的道德词汇进行描述,即逝者的哪一类型道德倾向得分更强,因此,这种"死者为大"观念导致的偏误不会对本研究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的总文本锚定相似度计算方法,测量的正是道德的表达倾向,反映了逝者四类道德得分的相对可能性。

与四类道德的测量相似,对社交地位测量的基本步骤如下:一是根据社交地位的理论内涵,构建起社交地位的词典如下:尊重、敬重、尊崇、爱戴、敬仰、拥戴、崇敬、推崇、崇拜、推重、敬佩、佩服、钦佩、敬仰、仰慕、榜样、模范、典范、楷模、表率、典型、声誉、名望、名气、声名、名誉、威望、声望、权威、人缘、芳名、受人欢迎、受人喜欢、招人喜欢、受欢迎。二是采用Sho等学者提出的词旋转器距离

①Bereczkei T., Birkas B., Kerekes Z., Altruism Towards Strangers in Need: Costly Signaling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Vol. 31, No. 2, 2010, pp. 95-103.

②谢晓非,王逸璐,顾思义等:《利他仅仅利他吗?——进化视角的双路径模型》,《心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9期。

③周涛,高馨,罗家德:《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

④政光景,梁玉成:《中国近现代死亡人口历史分布形态研究——基于海量在线逝者纪念数据》,《南方人口》,2022年第4期。

⑤梁玉成,政光景:《运动锻炼对道德人格的影响——基于海量线上逝者纪念文本的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的研究》,《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Word Rotator's Distance)计算的文本相似度即为社交地位得分[①]。

为了对比自我与他者取向、发展与克制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的强弱,本研究分别构建了他者—自我比对数和发展—克制比对数两个自变量。他者取向道德得分、自我取向道德得分、发展取向道德得分、克制取向道德得分的测量步骤与四类道德得分的测量一致。在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按如下公式计算相对得分:他者—自我比对数=ln(他者取向道德得分/自我取向道德得分);发展—克制比对数=ln(发展取向道德得分/克制取向道德得分)。他者—自我比对数越高,则逝者的道德越偏他者取向,发展—克制比对数越高,则逝者的道德越偏向发展取向,反之亦然。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逝者的社会经济人口属性,包括性别、年龄、是否读大学、是否有宗教信仰、职业声望得分、逝者出生世代、逝世时期。其中,职业声望得分是对职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大类,外加自由职业进行归类,并将其转换为职业声望得分[②]。逝者所属的世代为其出生年份,从1900—1999年,每10年分为一个世代,共10个世代。逝者所属时期为其逝世年份,从1950—2019年每10年分为一个时期,共7个时期。

因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逝者,纪念文本的道德、社交地位评价与撰写者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对撰写者特征进行控制。但由于缺乏撰写者的基本信息,所以本研究主要通过纪念文本的特征来代理撰写者特征。这些变量包括纪念文本撰写年份、撰写者编号、纪念文本长度、纪念文本是否属于道德主题、是否涉及地位评价。以上变量中,是否属于道德主题采用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的方法生成,如果某文本的道德主题概率最高,则编码为1,否则为0。是否涉及地位评价采用社交地位词典进行判断,如果出现社交地位词典中的词则编码为1,否则为0。表1是所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展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	比例或均值	观测值数
性别	——	87177
男性	69.000%	60152
女性	31.000%	27025
年龄	57.201	82645
是否读大学	0.001	145160
是否有宗教信仰	0.040	145160
职业声望得分	59.450	22165
逝者纪念文本长度	647.928	145160
是否道德主题	0.344	145160
是否地位评价	0.064	145160
自我发展道德得分	0.996	145152
自我克制道德得分	0.980	144739
发展型利他道德得分	0.972	144901
克制型利他道德得分	0.931	145032

①Sho Y., Ryo T., Reina A., et al., Word Rotator's Distan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0, pp. 2940-2960.

②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续表

变量	比例或均值	观测值数
他者—自我道德比对数	-0.034	145160
发展—克制道德比对数	0.043	145160
社交地位得分	0.375	145160
权重	1.000	64600
世代	——	90550
1900—1909	4.740%	4294
1910—1919	10.600%	9602
1920—1929	25.860%	23414
1930—1939	16.990%	15381
1940—1949	9.660%	8750
1950—1959	8.790%	7958
1960—1969	7.250%	6563
1970—1979	5.460%	4943
1980—1989	7.320%	6626
1990—1999	3.330%	3019
时期	——	94301
1950—1959	5.150%	4858
1960—1969	1.490%	1405
1970—1979	2.830%	2668
1980—1989	4.180%	3942
1990—1999	9.400%	8860
2000—2009	25.870%	24391
2010—2019	51.090%	48177
撰写时期	——	77564
2000—2002	3.380%	2618
2003—2005	3.960%	3070
2006—2008	6.560%	5089
2009—2011	14.050%	10894
2012—2014	48.420%	37555
2015—2017	14.620%	11336
2018—2021	9.030%	7002

(三)研究假设推断

根据获得社交地位的能力路径与美德路径以及道德价值理论中的能力—尊重机制、美德—敬

佩机制，可以推测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关系[①]。能力路径强调了个体的能力、素质与禀赋对地位的作用，这与自我发展和自我克制道德密切相关。美德路径则强调个体的利他主义特质对地位的作用，这与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密切相关。按照以上理论的推断，本研究关注的四类道德均能有效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由此可以推断出关于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研究假设。

“道德的正向效应”假设：四类道德均能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

因为上述理论中的能力和美德范畴不完全等同四类道德的内涵，因此，基于纯粹的理论逻辑来推断各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关系可能并不准确。所以，本研究还将基于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相关性来进行研究假设推测。由图2可知，自我发展道德与社交地位呈现负相关，而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则与社交地位呈现正相关。可见，数据的相关关系展现出的自我发展道德与社交地位的关系与基于能力—尊重理论推断出的关系并不一致，因此，这里提出“道德的正向效应”的竞争性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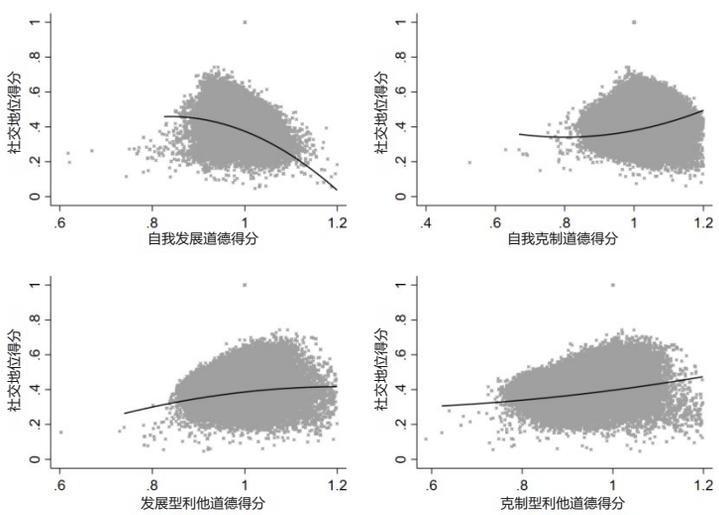


图2　四类道德得分与社交地位得分的相关性分布图

“道德效应的差异化”假设：自我发展道德使得社交地位降低，而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

为了比较哪一类的道德更有利于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本研究通过计算发展取向、克制取向、自我取向、他者取向的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词典的词向量相似度来推断研究假设。如图3所示，分布在虚线以上的词汇与纵轴距离更近，分布在虚线以下的词汇与横轴距离更近。总体来看，社交地位词典中的大部分词语在发展—克制取向的道德中更接近发展取向道德；在自我—他者取向的道德中，更接近他者取向的道德。过往研究也发现，在中国偏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关注他者的道德可能更为重要[②]。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发展取向道德相对优势”假设：发展取向的道德相比于克制取向的道德更能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

“他者取向道德相对优势”假设：他者取向的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的道德更能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

---

①Michael P. G. , Robbie C. M. van Aert, Mitja D. B. ,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s of Person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Size with Soci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50, No. 3, 2024, pp. 253-283.

②Bai F. , Beyond Dominance and Competence: A Moral Virtue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1, No. 3, 2017, pp. 203-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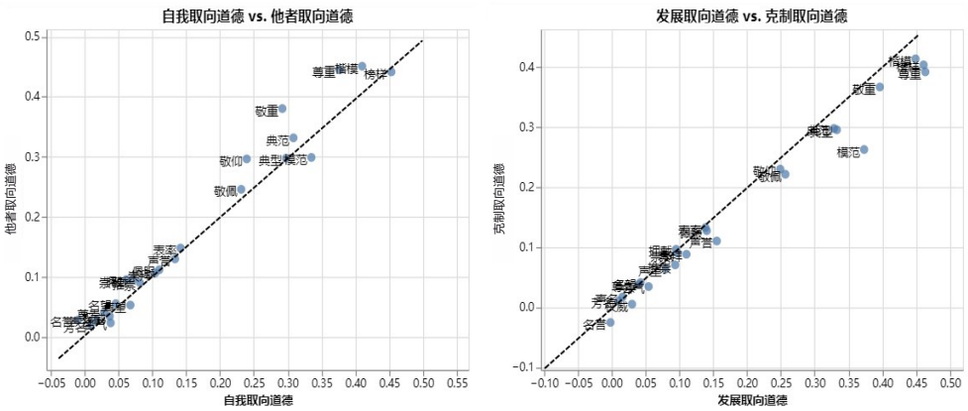


图3　社交地位词典与自我—他者、发展—克制取向道德相似度分布图

为了比较他者、自我取向道德以及发展、克制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影响的大小随世代和时期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分别计算了他者*地位—自我*地位比和发展*地位—克制*地位比，其分别体现了他者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关联度的相对优势和发展取向道德相比于克制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关联度的相对优势。他者*地位—自我*地位比=他者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语义相似度/自我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语义相似度，发展*地位—克制*地位比=发展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语义相似度/克制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语义相似度。本研究区分了不同的时期和世代来分别进行词向量训练，并分别计算他者、自我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词向量相似度比值和发展、克制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词向量相似度比值(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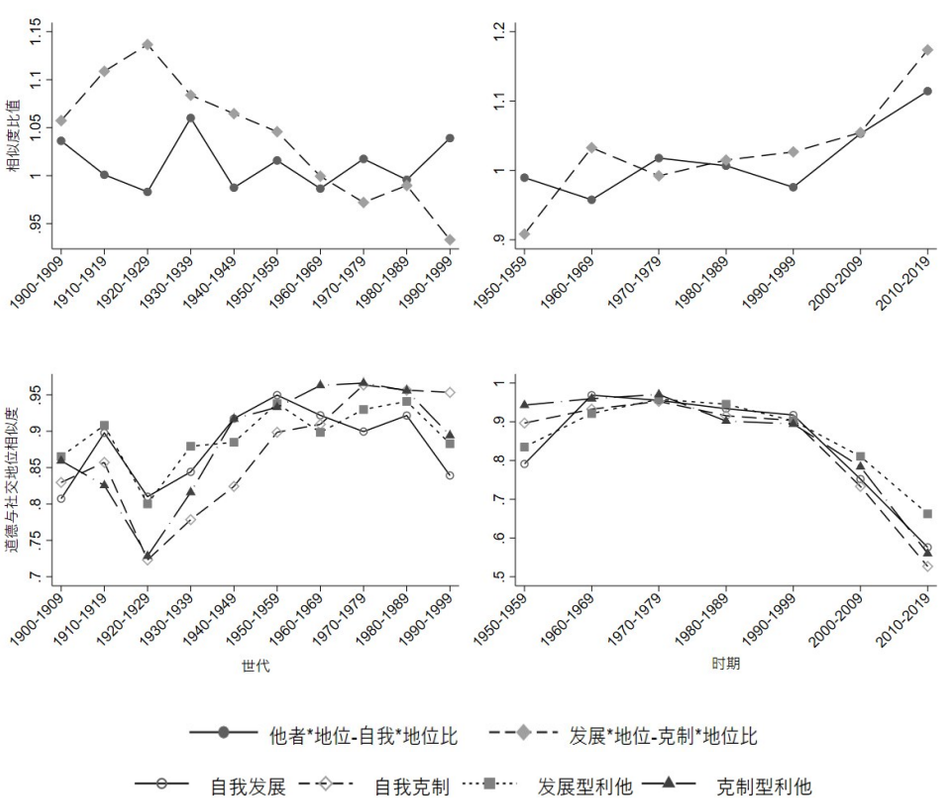


图4　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相似度及其比值的世代和时期分布图

随着世代的推移，他者取向、自我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相似度比值总体维持在1附近波动，说明二者与社交地位的关联度随着世代推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发展*地位—克制*地位比随着世

代推移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克制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的关联度相比于发展取向道德来说更为明显，克制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可能随世代越来越大。他者*地位—自我*地位比和发展*地位—克制*地位比随着时期发展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他者取向道德和发展取向道德与社交地位关联度优势越来越明显，即他者取向、发展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可能随时期越来越大。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研究假设。

“克制取向道德相对优势随世代凸显”假设：随着世代推移，克制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相比于发展取向道德来说表现越来越明显。

“他者、发展取向道德相对优势随时期凸显”假设：随着时期推移，他者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来说表现越来越明显，发展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相比于克制取向道德来说表现越来越明显。

更进一步，为了推测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化，本研究分世代和时期计算了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词向量相似度。图4中的左下图和右下图分别展示了四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相似度随世代和时期的分布。其中，纵坐标表示每一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相似度，相似度越高，则得分越高。在世代的分布上，越是年轻世代的道德与社交地位的相似度越大，尤其是自我克制和克制型利他道德这两类克制型取向的道德随着世代的推移，其增强的趋势最为明显，即“道德效应随世代增强”假设。从时期的分布来看，随着时期的推移，道德与社交地位的相似度呈现“梯度下降”分布，时期越往后推移，下降速度越快。由此可见，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效应可能随着时期推移存在下降趋势，即“道德效应随时期减弱”假设。

“道德效应随世代增强”假设：随着世代推移，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效应增强。

“道德效应随时期减弱”假设：随着时期推移，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效应减弱。

四、模型与结果

（一）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社交地位得分与纪念文本的撰写者是否选择进行社交地位评价密切相关，如某些撰写者特征或逝者特征会使得撰写者选择对逝者进行社交地位的评价，而某些特征则使得其不进行评价。这就导致了选择性偏误。因此，基于是否为地位评价变量，本研究采用了基于扩展回归分析的样本选择模型（Extend Regression with Endogenous Sample Selection）进行建模。

如表2所示，在自我发展模型的结果模型中，自我发展道德影响社交地位得分的系数为-1.951，且呈现高度的显著性。这说明自我发展道德越高，社交地位越低。在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模型的结果模型中，三者影响社交地位的系数为正，呈现高度的统计显著，这说明三类道德能有效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这一结果证明了“道德效应的差异化”假设。说明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不是所有类型的道德都能有效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这与基于西方社会情境的“道德的正向效应”假设推论是不一致的。在四类道德中，自我发展道德是偏向个体主义价值的，其他三类道德是偏向集体主义价值的。可见，在中国这种偏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体主义特征的道德是有损社交地位的，而偏集体主义的道德则有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而在西方偏重个体主义价值的社会中，个体主义特征的道德能有效提高社交地位，这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

他者—自我模型中，他者—自我道德比对数影响社交地位得分的系数为0.955，在统计上呈现高度显著。这说明他者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越明显，其越能促进社交地位的提高。发展—克制模型中，发展—克制道德比对数影响社交地位得分的系数为-0.796，呈现高度统计显著，说明发展取向道德相比于克制取向道德越明显，其社交地位会越低。以上两个模型的结果证明了“他者取向道德相对优势”假设，但证伪了“发展取向道德相对优势”假设。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中，他者取

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对提升社交地位更为重要。

表2　四类道德与不同维度道德比对数对社交地位影响的内生样本选择模型

变量	自我发展模型		自我克制模型		发展型利他模型		克制型利他模型		他者—自我模型		发展—克制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结果模型	选择模型
控制变量(已控制)												
自我发展道德	-1.951***	-1.079										
自我克制道德			0.613***	-6.894***								
发展型利他道德					1.107***	-3.004***						
克制型利他道德							0.928***	-2.849***				
他者—自我道德比对数									0.955***	-0.503		
发展—克制道德比对数											-0.796***	2.748***
残差相关系数		0.762***		0.125		-0.143		-0.242		-0.028		0.104
常数	2.222***	-2.193**	-0.206**	3.579***	-0.634***	-0.334	-0.355***	-0.775	0.476***	-3.346***	0.470***	-3.538***
观测值数	13493	13493	13449	13449	13471	13471	13478	13478	13494	13494	13494	13494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二)道德影响社交地位效应的时代变迁

在确定了各类道德及其比值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分析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随时代变迁的趋势,本研究采用四层次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CCREM)进行建模。采用这一模型是因为有三个层次的变量需要进行分解和控制:一是因年龄=时期(逝世年份)-世代(出生年份),需要对年龄—时期—世代的共线性进行分解①;二是对撰写者的时代效应进行控制。逝者的社交地位和道德评价还受到撰写时代特征的影响,因此,应该同时对撰写纪念文本的时期进行控制;三是对撰写者效应进行控制。因存在由同一个撰写者撰写多个纪念文本的情况,因此,这给控制撰写者效应提供了一个好的数据基础。

如图5所示,各个世代道德影响社交地位的边际效应均一致呈现出高度的统计显著性。从世代变迁的趋势来分析,总体上,自我发展道德边际效应虽然为负,但随着世代变迁明显增强,即其负效应在逐步减小。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的边际效应虽然为正,但总体都随着世代变迁在减弱。尤其是自我克制道德在1990—1999世代对社交地位的边际效应变为负数,说明其正从促进社交地位变为有损社交地位。以上结果说明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和克制型利他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随着世代变迁在减小,并存在变为负作用的趋势。这一结果总体上证伪了"道德效应随世代增强"假设,不论是自我发展道德的负面效应,还是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的正面效应,都随着世代在减弱。这说明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与偏集体主义的其他三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作用正走向一致。

①Yang Y., Land K. C.,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36, No. 3, 2008, pp. 297-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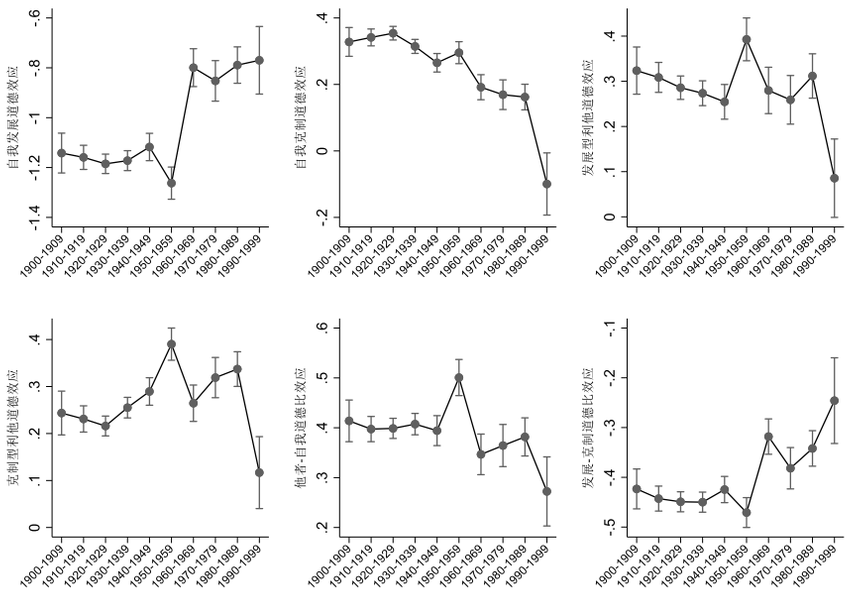


图5　道德对社交地位边际效应随世代变迁分布

从不同维度的道德对比来看（见图5最后两个子图），他者—自我道德比边际效应均为正，但随着世代推移在下降；发展—克制道德比边际效应均为负，但随着世代推移在上升，这说明他者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虽然有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但其相对优势正在下降；克制取向道德相比于发展取向道德虽然有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但其优势也在下降。这一结果证伪了“克制取向道德相对优势随世代凸显”假设，说明了他者取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虽然对社交地位边际效应具有相对优势，但其优势正在逐渐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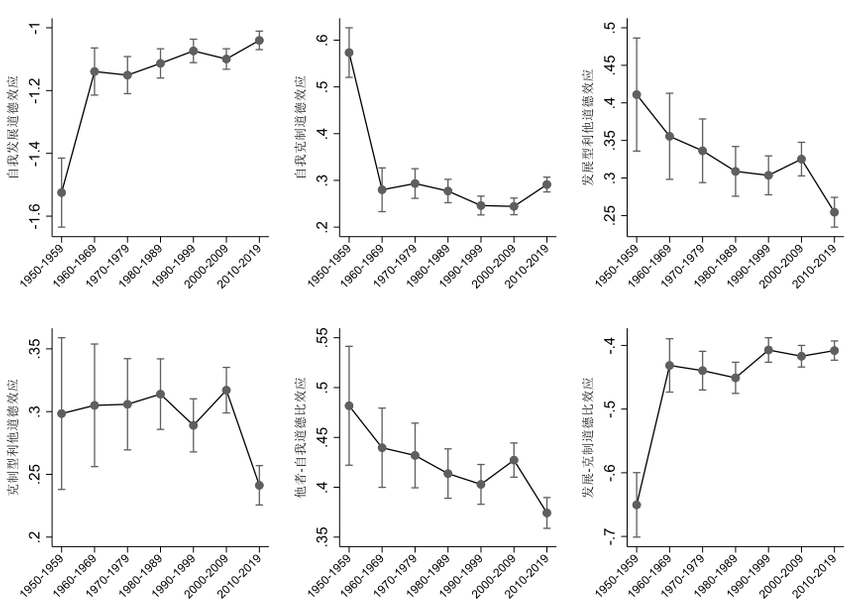


图6　道德对社交地位边际效应随时期变迁分布

如图6所示，与世代效应模型结果一致，自我发展道德的边际效应在各个时期均为负数，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在各个时期的边际效应都为正数。从四类道德总体趋势来看，

自我发展道德随着时期变迁,对社交地位的边际效应具有显著的增强趋势,也就是其对社交的负面效应在不断减小。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对社交地位的边际效应随时期变迁在不断减小,也就是其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减少。这一结果部分证明了"道德效应随时期减弱"假设,即除自我发展道德外,其余三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在减弱。

从不同维度的道德对比来看,他者—自我道德比边际效应均为正,但随着时期推移在下降;发展—克制道德比边际效应均为负,随着时期推移在上升。这说明了他者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虽然有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但其相对优势正随着时期变化在下降;克制取向道德相比于发展取向道德虽然有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但其相对优势随时期变化也在下降。这一结果部分证明了"他者、发展取向道德相对优势随时期凸显"假设,即随着时期推移,发展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相比于克制取向道德表现越来越明显。但以上结果证伪了该研究假设的"他者取向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相比于自我取向道德来说表现越来越明显"部分。

五、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本研究基于线上逝者纪念数据,采用理论与数据双元驱动范式进行研究假设的推论,并分别通过内生样本选择扩展回归模型和四层次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对四类道德对社交地位的影响及其随时代的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情境下,较高的自我发展道德有损社交地位,而较高的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有利社交地位的提高。从道德的不同维度对比来看,他者取向道德和克制取向道德相比于自我取向和发展取向的道德更有利于社交地位的提高。但是,随着世代变迁和时期变迁,自我发展道德对社交地位的负面作用和自我克制、发展型利他、克制型利他道德对道德的促进作用均在减弱。

相较于西方理论的道德带来更高地位的论断,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发现:较高的自我发展道德会导致个体的社交地位降低,这说明在以儒家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为主导的中国社会,较高的个体主义道德是不利于其社交地位的提升的。相较于西方社会个体主义道德的重视自我、重视发展,在中国社会中,对他者关注和对自我克制的道德是更为重要的,这一点既符合"克己复礼"的传统观念,也符合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模型下的现实需求。

通过趋势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这种道德效应的特殊性正逐渐消失。在世代和时期变迁中,偏集体主义的道德对社交地位的促进作用正逐步减弱,这一趋势可能与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兴起有关。在市场经济中,适应短缺经济的自我克制道德不仅不适应消费主义导引的经济模式,反而有损其发展,这也必然导致其对社交地位影响的削弱。从偏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道德负面效应的逐渐减弱也可以看到,其对社交地位的影响正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影响趋于一致,即个体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道德的社交地位效应具有收敛性。这也说明,中国社会道德的社交地位效应正在转型。那么,这一转型的背后机制究竟如何?这种转型是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推动了经济社会变革呢?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王文娟]